目录 MAIN CONTENTS

◎研究院动态

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暨北京大学 – 山西大学 云冈学研究中心成立 ·03

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成立大事记 ·06

“云冈学论坛”成功举办 ·08

第二届“山西石窟考古田野工作坊”圆满结束 ·09

著名考古学家杨泓先生莅校作系列讲座 ·10

山西大学图书馆成功举办“云冈学研究与云冈学文献建设”讲座 ·12

历史文化学院和云冈学研究院联合举办《山西大学云冈学建设与考古学科发展》专题讲座 ·13

◎学术活动

三大石窟联展，考古增色添彩 ·15

“龙门石窟保护研究成果发布暨龙门石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二十周年学术交流大会”在洛阳召开 ·18

“2020 敦煌论坛：纪念藏经洞发现 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开幕 ·19

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汉传佛教造像的艺术形式与演变学术研讨会” ·21

云冈石窟·北魏平城与民族融合学术研讨会在大同召开 ·24

《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25

专家学者齐聚大足 为川渝地区石窟寺保护利用支招 ·29

天下魏碑出大同：“云冈杯”首届全国魏碑书法双年展举行 ·31

目录 MAIN CONTENTS

◎云冈学研究

省委常委、大同市委书记张吉福在云冈石窟研究院调研 ·33

《学习强国》平台刊发云冈石窟200多篇相关文章视频 ·34

作为资源的文化遗产◇杭侃 ·35

云冈石窟是如何开凿的◇张靖 ·36

守护好石窟寺这份艺术珍宝◇杨雪梅 ·40

◎同仁学术

可汗祠探源◇张庆捷 ·42

荀子“论秦国内政”再审视◇孙家洲、李重蓉 ·44

也谈佛教造像的长安模式◇韦正、马铭悦 ·47

◎书刊推荐

《中国民族史学理论与实践研究》 ·14

《3–5世纪初北方古族史探》 ·23

《争膺天命: 北魏华夏天神祭祀考论》 ·39

日本云冈石窟研究著作目录(一) ·51

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暨北京大学 - 山西大学 云冈学研究中心成立 韩启德为研究院揭牌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云冈石窟研究保护的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搭建多学科交叉融合平台，深入挖掘云冈历史文化内涵，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增强文化自信，山西大学成立云冈学研究院。10 月 30 日上午，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暨北京大学 - 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我校图书馆举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为“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揭牌。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李青山出席。校党委书记王仰麟、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共同为“北京大学 - 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中心”揭牌。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府新闻办主任张羽，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周志清，省教育厅副厅长马骏，省文物局副局长赵曙光，大同市委副书记张强，大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王铁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贾新田，校领导黄桂田、李富明、韩勇鸿、梁吉业、张天才、卢宇鸿、杭侃等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副校长杭侃主持成立揭牌仪式。

黄桂田校长代表山西大学致辞。他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并介绍了我校筹建研究院和研究中心的背景，以及进行“云冈学”研究的优势。他表示，云冈学研究院和中心的成立，是省委省政府赋予山西大学的一项政治任务和重要使命，为山西大学发展又筑起了一个战略支点。学校定牢记总书记嘱托，不负省委省政府及社会各界厚望，扎实开展云冈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强合作，为弘扬云冈学的时代价值、建设文化山西做出应有的贡献。

张羽代表省委宣传部表示祝贺，他指出，云冈石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在 2000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云冈文化博大精深。云冈学研究院和研究中心的成立，对于推动云冈学研究的发展意义重大，为我省文博事业和文旅融合发展再添力量。希望学校按照“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的建设要求，打造云冈学研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高地，为建设文化强省、增强文化自信做出贡献。

马骏代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表示祝贺，他希望山西大学以此为契机，抢抓发展机遇，强化与北京大学、大同市政

府、大同大学等的战略协作，办优、办强、办名云冈学研究院，真正将研究院建设成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云冈学学术研究高地、文化传承创新阵地、决策咨询服务基地、创新人才培养领地。

张强代表大同市委市政府表示祝贺，他表示，做好云冈学研究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地方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和支持，大同市委市政府将全力促进校地联合共建，全力支持研究院和研究中心的建设，为共同保护好、利用好云冈石窟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赵曙光、贾新田、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泓先后致辞，对研究院和中心的成立表示祝贺，表示将继续关注、全力支持研究院和中心未来的发展建设。

云冈石窟是享誉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是我国多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见证，研究和保护好云冈石窟意义重大。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将依托山西省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聚焦佛教考古与佛教文化、民族融合等重大问题，联合北京大学、山西大学等校内外的优势力量，组建“北京大学-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中心”，采取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推动“云冈学”研究向纵深发展，以“双校双导师”的培养模式定向培养一批云冈学研究人才，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省文旅产业发展提供有效载体，为建设文化强省、增强文化自信做出积极贡献。

为加强研究力量，研究院组建了学术委员会，聘任了首批顾问和首批研究员。成立仪式上，副校长杭侃教授被聘任为云冈研究院首任院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聘任首届学术委员主任。同时聘请中国社科院杨泓研究员、龙门石窟研究所温玉成研究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王邦维教授担任顾问，聘请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庆捷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孙家洲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韦正教授为特聘研究员。

为支持研究院和中心建设，胡彦威总经理代表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捐赠 50 万元研究专项经费和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张焯院长代表云冈石窟研究院捐赠 3D 打印的云冈石窟造像和《云冈石窟全集》。

仪式结束后，韩启德一行在王仰麟、黄桂田陪同下，参观了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和校史馆，就未来研究院的建设及学校发展进行了深入交流。

研究院将对山西北朝佛教遗迹和民族融合的资料开展系统的田野考古调查，在此基础上结合学术界以往的研究，建立权威的山西佛教石刻研究数据库；利用部省合建山西大学的契机，充分发挥北京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学科优势，开展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共同申报重大科研项目，组织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推动相关学科建设，引领学科发展方向，打造国内顶尖、国际领先的云冈学学术高地。同时，将云冈学研究院建设成为一个开放的平台，争取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共同为山西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做出应有的贡献。

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大学、郑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有关学者；敦煌研究院、云冈石窟研究院、龙门石窟研究院、大足石窟研究院、龙门研究所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研究院所的专家出席



了仪式，共同见证了激动人心的时刻。

其间，学校还举办了“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云冈学论坛”。来自国内 30 余位学术界著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云冈学展开研讨，为云冈学研究建言献策，共话云冈学建设的美好未来。

（据山西大学新闻网）

新华社、人民网、光明日报、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中国日报网，山西网络广播电视台、山西新闻网、山西晚报，澎湃新闻、腾讯新闻、新浪网、搜狐网等中央、省市、网络众多媒体均对云冈学研究院揭牌成立活动进行了报道，阅读量近百万，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成立大事记

2020 8.30

1、省教育厅召开云冈学研究院建设方案论证会

8 月 30 日，山西省教育厅在山西大学召开云冈学研究院建设方案论证会。山西大学校领导黄桂田、殷杰、杭侃及省教育厅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处处长赵瑞出席会议，殷杰代表学校致欢迎辞。山西省委宣传部、省科技厅、省社科联、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相关负责同志和云冈学研究院团队主要成员共 20 余人参会。

杭侃代表学校从研究院的定位和宗旨、工作思路、重点工作、队伍保障、经费预算等七个方面，对建设方案进行了专题汇报。专家组针对研究院的建设畅所欲言，从云冈学体现的民族交融、佛学交流、文化自信、学术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论证意见，并一致认为，研究院达到了山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立项条件，建议省教育厅立项建设。

2020 9.3

2、省教育厅批准成立云冈学研究院

9 月 3 日，山西省教育厅批准山西大学成立云冈学研究院，并列入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进行重点建设（晋教科 [2020] 11 号）。

2020 9.30

3、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座谈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就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要继续探索未知、

揭示本源；二是要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三是要搞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四是要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这四点要求为新时代考古事业和历史研究指明了方向。

9 月 30 日，山西大学举办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座谈会。

我校历史文化学院、文学院、哲学社会学学院、美术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等院系所的教师代表在座谈会上结合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建设与云冈学学科发展规划要求进行了发言。

2020 10.29

4、自主设置“云冈学”目录外二级学科论证会

10 月 29 日下午，山西大学自主设置“云冈学”目录外二级学科论证会在山西大学会议中心召开。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导师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韦正，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王邦维，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张先堂，郑州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韩国河，西北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冉万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刘毅七位教授组成的专家组审阅了相关资料。经质询、评议和认真讨论，专家组一致认为，山西大学设置云冈学二级学科十分必要，已完全具备自主设置条件，培养方案合理、可行，同意山西大学在考古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设置云冈学二级学科硕士和博士点。

2020 10.30

5、云冈学研究院暨北京大学 - 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中心成立

10 月 30 日上午，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暨北京大学 - 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山西大学校图书馆举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为“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揭牌。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李青山出席。校党委书记王仰麟、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共同为“北

京大学 - 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中心”揭牌。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府新闻办主任张羽，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周志清，省教育厅副厅长马骏，省文物局副局长赵曙光，大同市委副书记张强，大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王铁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贾新田，校领导黄桂田、李富明、韩勇鸿、梁吉业、张天才、卢宇鸿、杭侃等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副校长杭侃主持成立揭牌仪式。

为加强研究力量，研究院组建了学术委员会，聘任了首批顾问和首批研究员。成立仪式上，副校长杭侃教授被聘任为云冈研究院首任院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聘任首届学术委员主任。同时聘请中国社科院杨泓研究员、龙门石窟研究所温玉成研究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王邦维教授担任顾问，聘请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庆捷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孙家洲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韦正教授为特聘研究员。

“云冈学论坛”成功举办

2020 年 10 月 30 日，云冈学研究院暨北京大学 - 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中心揭牌活动结束后，云冈学研究院在山西大学会议中心举办了“云冈学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南开大学、郑州大学、西北大学、敦煌研究院、龙门石窟研究院、云冈石窟研究院、大足石刻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博物院以及山西大学的 2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与会专家围绕云冈学的内涵、研究方法、学科建设及其学术价值等主题进行了精彩的演讲与对话。会上，云冈学研究院还就校内外研究队伍的汇聚、校外研究员来校开设专题课或专题讲座、各石窟单位之间的多方合作等议题征求了专家学者意见和建议。

（据山西大学新闻网）

第二届“山西石窟考古田野工作坊”圆满结束



由我校历史文化学院、云冈学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山西石窟考古田野工作坊（2020 年度）”于 11 月 3 日圆满结束。本次工作坊得到山西省文物局和学校的大力支持，共招收学员 20 名，分别来自山西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建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太原理工大学等高校，以及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南涅水石刻馆等单位。

工作坊对学员进行了为期 6 天的前期培训，特别邀请王邦维、张庆捷、李裕群、李四龙、杭侃、韦正、彭明浩、范佳翎等老师对学员们线上授课，培训内容涉及中外佛教史、北朝佛教遗迹与石窟寺考古调查的基本方法等内容。来自不同专业方向的学员们对佛教考古的基本内涵有了更深地理解，为下一步田野调查打下了坚实基础。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工作坊学员们在王炜、武夏、赵献超、彭明浩等老师的带领下，对祁县子洪石窟进行了实地勘察。子洪石窟开凿时间在北魏迁都洛阳前后，距今已有 1500 多年的历史，目前仍保存有 8 座洞窟和一些摩崖造像，是“云冈模式”南传的重要地点，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此次实习在学习和实践传统测绘原理的同时，还利用现代测绘技术对子洪石窟进行了细致记录。特别是，工作坊综合利用传统测绘、拍照 - 建模测绘以

及三维激光扫描等技术，获取了大量科学的数据和资料，为后续研究和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其间，佛教考古界的前辈杨泓、温玉成先生莅临现场指导工作，祁县县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保证了田野实习的顺利进行。

11 月 3 日，工作坊田野工作汇报会在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会议室举行，学员们就勘察工作情况进行了详细汇报，杭侃副校长对田野实习工作进行了认真点评，并与参会师生进行了热烈而深入地交流。学员们还参观了云冈学文献中心。

校党委书记王仰麟教授、副校长杭侃教授、图书馆馆长肖珑教授等在图书馆前与学员们合影留念，大家共同期盼考古事业更加美好的明天。

（据微信公众号“山西石窟考古田野工作坊”）

著名考古学家杨泓先生莅校作系列讲座

杨泓先生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汉唐考古、美术考古和中国古代兵器考古，出版有《中国古兵器论丛》《文明的轨迹——从考古发掘看中国文明的演进》《美术考古半世纪》《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逝去的风韵》《束禾集》等多部学术著作，并先后参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和《考古精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四十年纪念》等著作，主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古代兵器分册》。

11 月 2 日至 8 日，应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的邀请，著名考古学家杨泓先生莅临我校为师生作系列学术讲座。本次系列讲座共分四讲，讲座采取了线下与线上同步直播的方式，在线听众数量众多，影响广泛。

在第一讲《漫话考古论文的撰著问题》中，杨先生从自身的研究经历与经验出发，介绍了写作考古学论文的要点，并对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的总结与论述。

第二讲为《从穹庐到殿堂：漫谈云冈石窟洞窟形制的变迁》，杨先生以北朝民



歌《敕勒歌》为引子，分析了现有考古发现中的穹庐形制，推测了穹庐对于云冈部分窟顶形制的影响。随后，具体探讨了云冈石窟的形制变化，并由此谈及当时社会思潮的转变。

在第三讲《考古发现所见佛教艺术中国化》中，先生首先回顾了佛教的传播路径与时间，接着以考古发现为基础，从塔、佛殿、造像等几个方面系统分析、阐释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第四讲为《中国古代佛教石窟寺的发展和演变》，在这一讲中先生首先讲述了印度石窟的发展脉络与形制特征，特别解释了印度支提窟与毗诃罗窟两种窟形的具体形制与面貌。其次，以时间、空间为脉络，梳理了石窟在我国的发展路线与演变特征，并对石窟的艺术风格进行分析。

杨泓先生的系列讲座使同学们对佛教考古与美术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让大家对佛教考古有了整体的认识与理解。讲座结束后，同学们围绕讲座内容积极提问，先生一一给予详尽地回答，并鼓励大家继续探索。

先生为我校师生带来的这场系列讲座，论证严谨，实例丰富，内容广博，语言生动，不仅对现有的石窟寺研究成果进行了精妙的阐释与论述，使在场听众获益匪浅，更体现了前辈学者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为大家树立了今后学习与研究的典范。

（据山西大学新闻网）

山西大学图书馆成功举办云冈学研究与云冈学文献建设讲座

2020 年 11 月 20 日下午，图书馆特邀山西大学副校长、云冈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杭侃教授在 332 会议室举办了云冈学研究与云冈学文献中心建设的专题讲座。肖珑馆长主持了讲座，图书馆全体职工约 70 人参加了讲座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本次讲座的题目是《云冈学的研究与云冈学文献中心的建设》，杭侃教授主要围绕云冈石窟与云冈石窟研究的概况、云冈学建设的思考和云冈学文献中心建设的愿景三个方面内容展开。

杭侃教授运用丰富生动的图片，结合云冈石窟的历史、地理、军事、建筑、考古、美术、雕塑等多学科知识，全面细致地介绍了云冈石窟的发掘历史、建造分期和研究现状。在云冈石窟的研究现状方面，杭侃教授特别介绍了日本学者对云冈石窟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以及云冈石窟研究的奠基人宿白先生关于“云冈模式”的系列学术研究成果。在研究手段上，杭侃教授特别强调了是否要用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石窟寺研究，是现代石窟寺研究是否科学的唯一标志。

此外，杭教授通过云冈学与敦煌学的对比，为云冈学的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杭教授指出，应当从云冈石窟的历史地位出发，借鉴敦煌学的学科建设经验，构建云冈学特有的学科建设模式。云冈学的建设，需要依靠山西省内尤其是大同本地的考古和文物资源，尤其是北魏平城时代的遗迹和遗物，将平城时代的城市与聚落、墓葬、手工业、宗教遗存、中外文化交流等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杭教授还指出，一流的学科要有一流的图书资料做支撑，云冈学的学科发展离不开云冈学文献的支持，要将云冈学文献中心建设成为多学科交叉的全国云冈学的文献中心。文献中心建设的核心内容应分为云冈石窟的研究和保护、北魏平城时代考古资料的研究和保护以及云冈模式的广泛影响三个层级。文献中心的资源建设应在重点关注云冈石窟相关的史学、佛学、考古学等文献外，及时收录美学、建筑以及音乐等学科的相关文献，及时跟踪掌握学科建设的最新动态，了解研究的最新文献需求和发展需要，扎实做好云冈学研究的文献保障工作。

讲座结束后，与会人员就我馆云冈学文献资源的收集方法、建设的方向及建设

布局等问题进行了咨询，杭教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一耐心解答，座谈会现场气氛热烈。

座谈会最后，肖珑馆长进行了总结。肖馆长首先对杭侃教授表示感谢，她指出，杭教授的报告内容翔实，为我馆云冈学文献资源的建设工作提供了思路和方向，同时，图书馆作为高校信息高地，做好文献资源保障工作，助力云冈学学科建设是图书馆的责任。我馆将以本次座谈会为契机，持续关注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的工作进展、云冈学研究的文献需求，积极扩充云冈学文献资源，努力建设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云冈学文献中心，做好云冈学研究的文献保障工作，力争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云冈学文献信息高地。

（据微信公众号“山西大学图书馆”）

历史文化学院和云冈学研究院联合举办《山西大学云冈学建设与考古学科发展》专题讲座

11 月 24 日晚，副校长、云冈学研究院院长杭侃教授在历史文化学院主楼三层会议室作题为《山西大学云冈学建设与考古学科发展》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和云冈学研究院联合举办，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郝平教授主持。

杭侃教授以近期的石窟“热”和云冈“热”为切入点，提出了对云冈学内涵的深入思考，对其研究与学科建设的核心内容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他指出云冈学建设核心内容的三个层级为：云冈石窟的研究和保护、北魏平城时代考古资料的研究和保护、云冈模式的广泛影响，并介绍了开展三个层次研究的递进关系，阐释了开展云冈学研究



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杭侃教授还就云冈学学科建设的发展目标定位进行了说明。他指出，目前云冈学是在考古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先行建设，发展目标是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必须联合考古学、历史学、哲学、科技史、汉语言文学、美术、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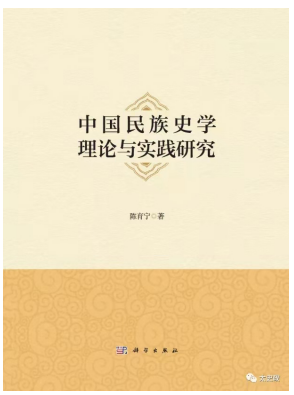
生物与医学、旅游、计算机等多个学科进行交互与融合，逐步推进云冈学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服务社会、文化传承等学科内涵式发展。他提出在多学科合作的基础之上，既要顶层设计，又要联合攻关，共同建设云冈学研究院，提升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

杭侃教授通过对国内高校考古学科的比较，分析了我校考古学学科所处的位置和努力方向。他强调考古学科的定位和发展目标很重要，要明确自身的现有优势和区域特色，希望考古学科继续加强和保持旧石器与古人类考古、文明起源研究、晋文化考古、北朝与隋唐考古等方向的优势，加强古代建筑、石窟寺考古和产业考古等薄弱方向的建设，凸显山西考古的特色和优势，努力提升我校考古学学科实力。

在互动环节中，杭侃教授就云冈学的学科设置与学科定位，石窟寺考古、考古测绘等问题与师生进行了交流。

（据山西大学新闻网）

书刊推荐



《中国民族史学理论与实践研究》

作者：陈育宁
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11

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全方位、系统地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主题，以探讨民族史学理论问题为主要内容，同时对西夏史、元史和地方史等展开研究。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论述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的若干基本问题、主要特点及其基本规律，资料翔实，逻辑严密，观点新颖，论证充分，深刻分析了民族史学理论领域内的重大问题，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特点和规律，对中国民族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三大石窟联展，考古增色添彩

石窟联展中的“考古魅力”

最近，全国多地喜提初雪，“石窟寺”“考古”等名词也频上热搜，10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11月13日，“全国石窟寺保护与考古工作座谈会”在洛阳召开；11月23日“2020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年会”在洛阳召开；11月27日成立“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

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以中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在党和国家对石窟寺保护利用和考古工作高度重视下，全国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不知不觉中，“丝路华光——敦煌、云冈、龙门石窟艺术联展”在洛阳博物馆的展期也已经过半，如果你错过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也无法去四川看丁真，“古今辉映、诗和远方”的洛阳真挚邀请您来洛阳博物馆参观三大石窟艺术展。

此次三大石窟联袂展出，敦煌、云冈、龙门石窟展厅除了反映石窟本体文化艺术的展品，还展陈了各自考古发掘出土的精美文物。亲爱的朋友，你想不想知道这些石窟已经开展了哪些考古工作、发掘出土了哪些精美文物，跟着小编快到洛阳博物馆二楼一起寻找答案吧！



2000年龙门石窟奉先寺遗址考古发掘出土造像



云冈石窟考古发掘出土造像
（云冈石窟研究院供图）



敦煌莫高窟考古发掘出土塑像
（洛阳博物馆黄超 摄）

延伸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三大石窟开展的重要考古发掘工作

01 敦煌莫高窟进行的主要考古发掘工作

① 1963 ～ 1966 年和 1979 ～ 1980 年，为配合莫高窟南区崖体加固工程，敦煌文物研究所两次对莫高窟窟前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发现了一批殿堂遗址和一些新的窟龛。

② 1988 ～ 1995 年，对莫高窟北区 243 个洞窟进行了全面科学的清理发掘，发现了不同类型和功能的洞窟，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遗物，基本弄清了北区石窟的全貌和内涵。

③ 1998 年对莫高窟下寺，1999 年莫高窟第 66—78 窟窟前遗址、第 96 窟，2001 年对莫高窟上寺与中寺，2002 年对莫高窟第 476、365 窟，2004 年 3 月对莫高窟第 161 窟上方崖顶土塔与第 130 窟崖顶的佛堂遗址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和发掘工作。

02 云冈石窟进行的主要考古发掘工作

① 1972 ～ 1974 年，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在五华洞前进行了考古清理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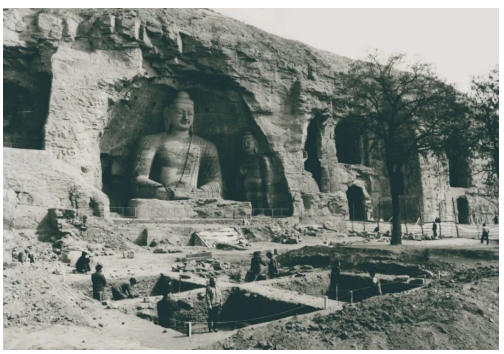
② 1987 年，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对龙王庙沟西侧石窟窟前建筑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

③ 1992 ～ 1993 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云冈石窟窟前地面进行了整体清理发掘，并对第 3 窟窟内及窟顶东部塔基遗址进行了发掘。



1999 年，莫高窟九层楼发掘（敦煌研究院 供图）

④2008～2012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和云冈石窟研究院联合，对云冈石窟窟顶一区（第39窟窟顶以西）和窟顶二区（第5、6窟窟顶）进行了发掘。



云冈石窟第20窟窟前遗址发掘
（云冈石窟研究院供图）

03 龙门石窟进行的主要考古发掘工作

20世纪60～80年代，配合保护工程，对西山窟前一些区段进行了清理，出土有一些精美文物。2000年龙门石窟申报世界遗产成功以来，陆续开展了多个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

①至2002年，龙门石窟研究所、洛阳市文物局与意大利那波利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合作完成了奉先寺遗址考古发掘第一阶段工作。

②2008年，龙门石窟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联合对龙门石窟东山擂鼓台窟前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③2016年至2017年，龙门东山万佛沟北崖新发现两座小型窟龛，龙门石窟研究院考古人员对外部堆积进行了局部考古清理。

④2011年，龙门石窟研究院与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对龙门西山北坡唐代僧人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⑤2016年，龙门石窟研究院考古人员对东山石窟万佛沟区新发现的两座瘗窟及窟外遗址进行清理和考古发掘。

⑥2016年至2019年，龙门石窟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方联合组成唐代香山寺遗址考古队，进行了龙门唐代香山寺遗址的考古发掘（第一期）。

（据微信公众号“中国石窟寺”）



2008年龙门石窟东山擂鼓台三洞窟前遗址考古发掘

“龙门石窟保护研究成果发布暨龙门石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二十周年学术交流大会”在洛阳召开

10月19日下午，由洛阳市人民政府、河南省文物局主办，龙门园区管委会、龙门石窟研究院承办的“龙门石窟保护研究成果发布暨龙门石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二十周年学术交流大会”在洛阳召开。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等出席开幕式。

洛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魏险峰介绍了龙门石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年来的发展情况。20年来，洛阳市始终坚守申遗承诺，认真履行《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遵守遗产保护准则，切实承担起对龙门石窟的保护职责，围绕确保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遗产保护、环境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敦煌研究院考古所所长张小刚宣读了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贺信。贺信中樊锦诗勉励龙门石窟研究院在坚持保护研究与传承弘扬相结合的前提下，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手段,完善人才激励机制，推动龙门石窟研究院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会上，龙门石窟发布了近年来在石窟保护、石窟考古、数字化应用、文旅融合等方面取得的重要保护研究成果。专家学者围绕石窟寺遗产保护与科技发展、石窟寺研究与考古发展、石窟寺文化遗产数字化技术的应用等主题进行深入探讨交流。

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洛阳市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国石窟寺遗产地管理机构、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事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历史、考古、宗教、艺术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据微信公众号“中国石窟寺”）

“2020 敦煌论坛：纪念藏经洞发现 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开幕

11 月 7 日，由敦煌研究院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共同主办的“2020 敦煌论坛：纪念藏经洞发现 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在敦煌莫高窟召开。论坛是敦煌学史上承前启后的盛会，旨在纪念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这一中华民族和全人类重要文化遗产发现 120 周年，总结敦煌学百余年来的研究成果和历史经验，推动 21 世纪敦煌学的更大发展。

大会共邀请 150 多位资深敦煌学专家学者与会。专家们将聚焦敦煌藏经洞及其出土文物研究、流失海外敦煌藏经洞文物数字化回归模式研究、丝绸之路多宗教多民族文明交融与文化互鉴研究、丝绸之路艺术与考古研究等议题展开专题发言和研讨。

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国强、甘肃省文物局副局长陈于柱、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赵国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郝春文、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王国强在致辞中指出：“敦煌研究院作为世界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作为联系和团结国内外敦煌学研究机构和研究学者的重要堡垒，要继续充分发挥好平台作用、凝聚作用，共同谋划、携手并进，推进敦煌学的持续繁荣发展。甘肃省委宣传部将大力支持，与敦煌学者一道，紧抓机遇，推进敦煌学在新时代再上新台阶，绽放新光彩”。

陈于柱在致辞中表示：“藏经洞的命运和敦煌学的发展始终与国同休共戚。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重要讲话和关于石窟寺保护利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切实担负起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甘肃省文物局愿与学术界一道，支持敦煌研究院再接再厉，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努力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

赵国英在致辞中讲到：“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蕴含着中华民族坚韧

不拔的文化精神。大力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保护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脉络，做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创新者和传播者，是我们这一代敦煌学科研人员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我坚信，本次论坛必将结出丰硕的学术果实，在敦煌学学术研究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郝春文在致辞中介绍了未来五到十五年间敦煌学界的重要工作规划，包括出版新版敦煌石窟全集、建立全球敦煌文献资源共享平台在内的八项工作被列入其中，这些工作即将开始落地实施。他希望国内敦煌学者能够继续保持开拓进取的研究态势，并欢迎国际敦煌学专家加入研究阵营，推动国际敦煌学研究工作取得进一步突破性进展。

赵声良在致辞中回顾了藏经洞发现120年来的历史，回首了百年来敦煌学发展的历程和敦煌研究院艰苦卓绝的76年奋斗史，并向一百多年来为敦煌学术事业作出卓著贡献的敦煌学前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他说，“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敦煌曾经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汇之地，敦煌石窟和藏经洞出土文物体现着4世纪到14世纪一千多年间多元文明荟萃、交融的结晶，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敦煌文化真实反映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创新发展，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伟大变革时期，时代在敦煌学者，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进一步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敦煌学不断深入。我们今天研究敦煌学，就是要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方向努力前行，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

论坛举办期间，还将召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理事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会和领导机构。

（据敦煌石窟公共网）

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汉传佛教造像的艺术形式与演变学术研讨会”

2020 年 11 月 19 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汉传佛教造像的艺术形式与演变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旨在为佛教造像艺术、佛教考古领域的学者提供一个展示、交流研究成果的学术平台，并配合中国国家博物馆“相由心生——山东博兴佛造像展”活动，推进中国区域佛教造像研究向更广博的领域发展。研讨会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河北博物院、北京服装学院、山东大学、博兴博物馆等多家研究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与馆内研究人员共同开展研讨，国家博物馆、山东潍坊市博物馆相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负责人陈煜出席本次研讨会并致开幕辞。他表示，这次举办的“汉传佛教造像的艺术形式与演变学术研讨会”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立足百年积淀，第一次主办以佛教造像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意义非同凡响，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能够促进国内佛教造像研究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加强国博与学界的沟通与联系，提升国博造像研究的整体水平。

开幕式后，研讨会进入了上午场主旨发言环节，由国博研究院副院长霍宏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魏道儒研究员首先进行了《佛教造像与中国文化精神》的演讲。他提到，中国的佛教造像是中印文化交流互鉴的艺术结晶。在中国人特有的审美观念、审美情趣、审美意向指导下塑造出来的佛、菩萨形象，以观音、弥勒为代表，具有了超越时代、超越种族、超越宗教的永恒魅力。中国文化精神和艺术家的追求，是中国佛教造像不同于其他国家与地区佛教造像的根本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李建欣研究员表示，地方佛教文化研究是中国佛教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和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佛教研究的深化、细化和具体化。地方佛教文化研究需要来自考古学、历史学、佛教研究、艺术学等不同学科的参与和协作。河北博物院原副院长刘建华研究员认为，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教造像是目前国内所见最早的金铜单体佛造像，造像风格既有古印度与中亚的影响，也有中原北方造像特征。从山东博兴地区出土的部分造像特征可以看出十六国时期造像的深远影响，特别是为河北、山东两地的佛教造像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故

宫博物院器物部冯贺军研究员介绍了故宫博物院藏汉传佛教造像，通过对清宫旧藏、接收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文化局等单位调拨、文博单位地交流互换、收购和捐献等不同来源造像进行了梳理，并对相关重点文物做了介绍。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何志国教授提出，在早期金铜佛像和造像碑等上面，至少发现佛、菩萨造像与铭文混淆现象十六例，年代从北魏晚期至隋，延续近百年。在五世纪晚期，佛、菩萨名实混淆与莲花手观世音向无畏手观世音造型的转变有关。这种现象很可能说明民众把佛教造像当作神灵，俗语“求神拜佛”是千百年来民众对佛教造像认识的最好注脚。

研讨会下午场发言分为了三场。第一场发言由华东师范大学何志国教授主持。山东博兴博物馆馆长张淑敏副研究员介绍了博兴北朝至隋代的佛教造像，对博兴出土佛造像情况、博兴佛造像特点及题材作了梳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振光研究员从遗址的考古勘探及认识、考古发现与收获等方面介绍了博兴近年来的考古工作成果。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高继习副研究员分析了定州系白石佛教造像的空间分布向东到达山东博兴，而博兴又恰恰是白陶佛教造像的中心，很可能白陶造像是作为白石造像的替代品出现的，用于特殊的佛教仪式场合。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佛造像研究所佟春燕研究员介绍了“相由心生——山东博兴佛造像展”的展览设计，从展品选取、展览结构设置以及辅助展品设计三方面回顾展览设计过程，并就展览策划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在场专家进行了讨论。

研讨会下午场第二场发言由国博研究院佛造像研究所佟春燕所长主持。国博研究院副院长霍宏伟研究员分析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铜镜中涉及佛像、罗汉、飞天、经咒及修寺塑像铭文的内容，他认为这些题材内容时间跨度较大，由此反映出佛教文化对于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国博藏品保管部张萌副研究馆员考证，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类伏膝枕颔造型的佛像不应该被称为“雪山大士”，应被称为释迦冥思像。此类图像表现的是释迦牟尼从人格化形象向神格化形象过度的重要阶段，集苦行像和思惟像于一体。北京服装学院美术学院邱忠鸣教授通过考察相关造像记来审视现存中古大型佛造像出现的关键性问题，分析在中古中国早期出现这类大像的原因及其在整个世界区域艺术史的较大坐标中的位置和作用。国博研究院佛造像研究所马宗洁副研究馆员对南北朝佛像金面的相关教义进行梳理和分类，并与河北、山东、四川、陕西等地的佛像金面相关文物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南北朝佛像金面的意义，探讨南北朝佛像金面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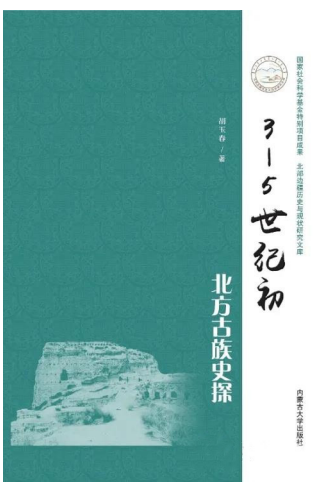
研讨会下午场第三场发言由国博研究院佛造像研究所佟春燕所长主持。国博图书资料信息中心负责人翁淮南分析了“一带一路”视阈中国佛造像“西化”“汉化”“藏化”“华化”“全球化”等历程，提出要在“一带一路”视野下开展佛造像中国化及海外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夏德美副研究员提到，中古时代佛教极为盛行，渗入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研究中古佛造像，至少应该从艺术、宗教、政治等三个视角展开。国博博士后研究人员蔡晓菁结合佛教中国

化视角来分析造像碑的具体功用和类型，更侧重于考察造像行为与佛教发展的互动关系。

与会专家发言与讨论结束后，国博研究院霍宏伟副院长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本次研讨会过程中，二十余位专家学者与多位参会人员就中国佛教考古新发现与新认识、汉传佛教造像的艺术形式与演变等热点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也为古代佛教造像的保护和利用、研究和传承提出了建议，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展陈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学术支撑，也进一步推进了我馆佛教造像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据“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书刊推荐



《3-5 世纪初北方古族史探》

作者：胡玉春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7

东汉末年，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流动，造成了北方各族在同一地域内交错杂居，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重组和整合现象，形成了许多新的族体，如铁弗、拓跋、宇文、乞伏、慕容、敕勒等。这些族体大都在 3 世纪到 5 世纪经历了由发展、壮大到被散亡的过程。同时各族活动地域犬牙交错、族源关系密不可分，且存在广泛的上层联姻，北方地区的民族隔阂和差异性逐渐减少，实现了广泛的、深入的民族交融。本书拟针对十六国北方地区这些错综复杂的部族活动展开研究，对这一时期北方诸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各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和交融等问题做有益的探讨，对于各部族形成、发展、消失的纵向历史提出有学术讨论价值的论证。

云冈石窟·北魏平城与民族融合学术研讨会在大同召开

12月7日，由山西省人民政府、北京大学主办，山西省文物局、大同市人民政府、中国文物报社、山西大学、云冈石窟研究院承办的云冈石窟·北魏平城与民族融合学术研讨会在同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敦煌研究院等石窟寺研究单位的知名专家、学者共赴盛会，专题研究云冈学学科建设的任务与路径，共同探讨北魏平城在中西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藏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集中交流云冈石窟保护的技术方法和最新成果。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张吉福，副省长张复明，省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润民，市委副书记、市长武宏文，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总督学王东以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雷兴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山西大学副校长、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院长杭侃等专家学者出席开幕式。省政府副秘书长丁纪岗主持，副市长翟永清参加。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冈石窟考察时强调，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目前，我省已成立了大同大学云冈学学院，组建了云冈文化生态研究院，山西大学与北京大学联合成立了云冈学研究院，并在云冈石窟举办了“游山西·读历史”启动仪式、大同北魏文化和民族融合开明文化论坛等。本次研讨会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冈石窟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部署的又一次实际行动和重要举措，对推动云冈学建设，加强云冈石窟研究与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张吉福在开幕式上致辞，他希望各级各有关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围绕“民族融合”这一主题、“文脉传承”这一主线、“创新发展”这一主轴，切实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挖掘云冈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以大格局、大视野、大境界，展示好北魏文化这一中华文明瑰宝，让无数珍贵的文物、遗产、文字活起来，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

张复明代表省政府对此次学术研讨会

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各学术机构、与会专家长期以来对山西文物事业和云冈石窟保护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要求各有关部门认真听取、积极吸纳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学习借鉴敦煌研究院、大足石刻研究院好的经验和做法，进一步推进云冈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着力在人才引进、平台建设、体制改革上大胆创新、敢闯先试，为云冈石窟保护研究和利用管理培养一批高端人才和实用人才，打造全国石质文物保护研究的新高地。

雷兴山指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将把此次研讨会作为新的奋斗起点，集中全校学科、人才、资源优势，高水平建设好北京大学·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在石窟考古、人才培养、石窟寺保护研究、高科技成果应用等方面持续发力，为助力山西、助力大同保护研究好云冈石窟，将云冈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学科贡献智慧和力量。

开幕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韦正分别围绕《平城时代：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关键时代》《北魏平城时代——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的关键时代》作了主旨发言；当天下午，与会专家、学者还围绕云冈学学科建设、民族融合及国际人文交流、石质文物保护等主题进行了学术交流研讨。

（据“大同新闻网”）

《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2020年11月15日上午，《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举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赵剑英，本书主要作者、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郝春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马援，参加会议并发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王茵主持。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原常务理事王邦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魏明孔，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原副会长张先堂，兰州大学教育部文科基地敦煌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郑炳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王素，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原主任黄正建，浙江大学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原副会长张涌泉，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李鸿宾，浙江大学教授、中

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刘进宝，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刘屹，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孟宪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雷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任士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张荣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赵贞，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游自勇等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2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座谈。参加会议的还有本书其他两位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宋雪春、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武绍卫，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与考古中心副主任刘志兵、责任编辑安芳等。

赵剑英社长认为，《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全面回顾了敦煌学百余年来的研究成果和历史经验，梳理了中国敦煌学发展的历史，对敦煌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分期，书写了中国学者不同时期在敦煌学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并总结出现有敦煌学研究工作中尚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同时，积极探索敦煌学研究的新范式、新视角，开辟未来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为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他指出，学术思想史的梳理是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5 · 17 讲话精神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这本书是《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中的一种，丛书不仅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哲学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而且重视冷门绝学，也推出了李均明等《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王宇信的《新中国甲骨学研究》等著作。丛书的出版对于建构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丛书的出版对于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这样一个学术思想史的梳理，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过的思想之路，我们的探索、成果和理论创新历程。通过本书对国内学者关于敦煌学研究的系统梳理，可以表明中国学者已经掌握了国际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

郝春文教授在致辞中回顾了自己三十多年从事敦煌学学术史研究的历程，认为《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一书的写作，对他来说既是一次总结，也是一次提高。他认为，对学术史的介绍和回顾，向读者讲授知识、展示方法、传达智慧。讲知识是为了领会智慧，而启迪智慧应该是教育最本质的指向。在该书后记中，郝教授界定了学术史写作的“四境界说”，为今后学术史的写作指明路径，并展示了广阔的空间。温故知新，鉴往知来。在该书的结语部分，郝教授也对未来敦煌学的发展做了展望，并且这些建议多数为有关部门采纳，被吸收进国家“十四五”及中长期敦煌学研究规划。

马援局长指出，《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一书的出版，具有特殊的标识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 5 · 17 讲话中提到，对于传统学科、濒危学科、冷

门学科，要加强保护和传承。继承性是从传统来的，但创新性，则是在学科和学科之间不断开辟新的领域、提出新的观点。在敦煌学领域，随着各个分支学科的发展，能够碰撞出一个新的领域来，所以敦煌学创新性的空间巨大。敦煌学是中国的传统国学，是能够走到国际前沿进行对话的。敦煌学的建设和发展，对于其他学科都能提供很好的借鉴。

荣新江教授指出，《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是自 1992 年林家平等先生出版《中国敦煌学史》之后，一本新的有系统的中国敦煌学史研究著作，填补了很长时段以来中国敦煌学史研究的空白。这本书首先对中国敦煌学研究做了分期工作，把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又根据敦煌学的发展在内部分成不同的时期来加以论述，建构了整部书合理的框架。第二，对于重要的敦煌学成果做了没有遗漏的评述。本书评述了大部分重要的和我们视线所及的大型图录、考古报告、著作、论文，甚至一些重要的书评，尤其是对于敦煌学的历史、敦煌的文献以及敦煌文献整理方面评述非常细致，可以透过这些评论话语了解著作的内容。第三，在评述中有自己的见解。在评述中可以看到作者有许多精彩的点评，该书敢于在一些论述中提出一些看似商榷甚至批评的意见，但大部分是用春秋笔法将批评和评价寓于叙述当中，这在中文著作中是非常难得可贵的。结语中，作者提出的新范式和新视角来开辟新领域，给 2020 年敦煌学提出了一个新的起点。

王邦维教授、魏明孔研究员认为这部书是里程碑式的著作，对于推动敦煌学的研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认为郝春文教授及其团队，在学术理念和学术操作上，为我们提供很好的范例，体现了甘于寂寞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

张先堂研究员指出，这本书的编写出版正当其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一是学术史的意义。藏经洞发现 120 周年，敦煌学的研究也已经有 110 年的历史，所以有必要做一个完整的学术史的总结。二是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去年视察敦煌，今年在政治局的学习会议上对历史研究、考古研究都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敦煌学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这本书的出版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第三，这本书的出版改变了中国敦煌学研究史著作匮乏的局面，具有重要的学术开拓意义。这本书全面介绍了 110 年来中国敦煌学研究成果，梳理了中国敦煌学的发展脉络，堪称一部迄今最为完整系统的中国敦煌学史，而且对于今后敦煌学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郑炳林教授认为这本书的评述具有代表性，评述结合，总结到位。这本书在引导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才培养方面，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故宫博物院王素研究员认为，这本书不仅是厚重的敦煌学术史的著述，还能从分析到取舍，再到境界，成为衡量敦煌学学术史的一个标杆。

黄正建研究员认为，敦煌学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学术领域，敦煌学史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学术思想史，这方面意义重大，符合敦煌学七十年来取得的成绩，以及在当代学术史中的地位。这本书的出版对于中国敦煌学既有总结意义，也有展望意义，

是一部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学术史著作。

张涌泉教授认为这本书高屋建瓴，视野宏阔。一百多年来，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骄人的成绩。本书作者没有简单的罗列论著名称，而是高屋建瓴把敦煌学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三个时期。第二，本书的评述论定实事求是。第三，本书学理分析、引领方向。作为一部优秀的学术史著作，除了对具体论著进行客观点评以外，还善于从更广阔的视野，从总体性、全局性的角度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引领学术发展的方向，进行学理分析，从理论和方法的层面分析写出高水平成果的原因和路径，这本书在这方面的确做出非常可贵的努力。

李鸿宾教授从郝春文教授的学术追求方面做出阐述。刘进宝教授认为这是一部划时代的、优秀的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学术史专著，也是一部学理性的当代敦煌学史。刘屹教授、孟宪实教授、雷闻研究员、任士英教授、张荣强教授、赵贞教授、游自勇教授分别就该书做出了精彩点评。与会者也对本书的内容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2019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敦煌时曾谈到，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的出版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敦煌研究院重要讲话的成果，对于我们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据今日头条账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专家学者齐聚大足
为川渝地区石窟寺保护利用支招

人民网重庆 11 月 28 日电 石窟寺作为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在数千年历史发展中，保持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外来文化，不断创新的文化艺术成果。其中，大足石刻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典范，是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

如何做好石窟寺的保护和利用工作？11 月 27 日，“中国石窟寺考古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大足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云冈石窟研究院、龙门石窟研究院等专家齐聚，围绕如何推进石窟寺考古工作，以及石窟寺考古的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探讨。

川渝佛教石窟艺术构成重要的西南板块

据统计，重庆地区现有石窟寺 917 处，具有时代跨度长、艺术价值高、造像规模宏大等特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多达 75 处，造像 5 万余尊，是唐至南宋时期中国石窟艺术史上最为壮丽辉煌的诗篇。

“在中国石窟寺发展的文化链条中，川渝石窟寺具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介绍，唐宋是佛教文化中国历史上发展孕育最为成熟的阶段，大足石刻刚好诞生于这一时期。川渝两地的石窟寺艺术，在中国佛教石窟寺艺术中构成了非常重要的西南板块。

在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崇峰看来，大足石刻早已声名在外。提起首次来到大足石刻的经历，他记忆犹新。“当年在邮亭下火车后再到大足石刻花了三个小时，交通极为不便。另外就是游客很少，文物保护也是最为传统的方式。”他说。

如今的大足石刻游客多了，又升级为大足石刻研究院。“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文旅价值都得到进一步提升。”李崇峰说。

川渝地区联手助推石窟艺术发展

霍巍认为，目前看来，川渝地区是最有可能成为南方石窟艺术的核心区域。他

建议，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背景下，应加强两地联手互动，共同推进石窟艺术与石窟文化的研究。

“以大足石刻为中心，还有许多中小型石窟如众星捧月般分布四周，它们都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距离大足 70 公里的四川省安岳县，就有大量精美的石窟寺。”霍巍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对川渝地区的石窟寺进行摸底、调查。“除了大型石窟寺之外，还有许多小型的也需要研究，它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充实大型石窟寺的细节。”

要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石窟寺文化，离不开科学的考古报告。此外，还要借助民俗、艺术、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力量，对川渝石窟寺开展多层面的综合研究和保护利用，以丰富的方式、全面的角度对石窟寺加以呈现。

“希望川渝两地能够从实现全民文化建构的高度进行合作，奠定川渝石窟寺的地位。在文旅结合方面树立起重要的核心区域，最终与北方的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霍巍说。

打出“组合拳” 让石窟寺“活”得更久

石窟寺虽然已历经千年，可是许多石窟寺如同进入垂暮之年的老人，已经“百病缠身”。为了让其能够更为长久的“活在当下”，石窟寺的保护、利用与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会上，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向大家介绍了《大足石刻全集》编撰的经过与体会。该书籍共计 11 卷 19 册，历经 14 年的考古调查和科学研究编撰而成，全面客观地记录和反映了 5 处石窟的现存状况和历史遗存信息。

此外，会议还对人才培养问题进行讨论，希望能够尝试与更多高校建立联合培养人才的机制。同时，希望大足在川渝地区能够发挥领头羊作用，带动周边地区石窟寺的保护、利用和研究。

为充分发挥考古学调查、发掘、归纳、整理、分析和研究实物资料的优势，整合全国各地以佛教考古为主的宗教考古研究力量，会上还成立了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接下来，将以该委员会为核心学术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等高校为重要学术指导单位，与各地石窟寺的管理和研究单位紧密合作，共同推进石窟寺考古工作和石窟寺考古人才的培养与轮训。

（据人民网）

天下魏碑出大同：“云冈杯”首届全国魏碑书法双年展举行

牢记领袖殷殷嘱托，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云冈杯”首届全国魏碑书法双年展举行。

按照中共山西省委统一部署，由省委宣传部、大同市委市政府、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共同主办的“云冈杯”首届全国魏碑书法双年展 11 月 22 日在大同举行。

本次活动以“魏碑故里天下大同”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论述和视察云冈石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展示魏碑艺术创作风貌与研究成果，促进魏碑书法艺术、石窟碑刻艺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广“游山西就是在读历史”理念，引导人们传承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活动自 7 月 31 日启动以来，得到了全国书法界专家学者和书法爱好者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共征集魏碑书法作品 4800 余件。历经初评、复评、半决赛、决赛的多轮评比，最终五名选手凭借精湛的书法功底和出色的临场发挥，在 11 月 22 日的总决赛中脱颖而出，一人获特等奖、四人获一等奖。

“云冈杯”首届全国魏碑书法双年展活动的成功举行，进一步擦亮了“魏碑故里天下大同”的区域文化名片，是山西践行领袖殷殷嘱托，聚焦文化自信、文旅融合，深入实施文化强省战略的生动实践和新的成果。

据了解，参加展出的既有大赛获奖作品，也有特邀名家作品，既有以“平城十二品”为基调的精品，也有取法北朝造像、摩崖、墓志、碑碣书风的佳作，充分体现了“用墨迹展示魏碑书法高度、以精品阐释魏碑独特美学”的办展目的。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吕岩松，省委常委、大同市委书记张吉福出席活动，并与原国家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杨志今，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夏潮，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等，一道为“云冈杯”首届全国魏碑书法双年展和“魏碑故里 天下大同”字碑揭幕，为获奖选手颁奖。

延伸阅读：

魏碑故里 天下大同

大同是一座有着 2300 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两汉名郡、北魏京华、辽金西京、明清重镇等形成蔚为大观的文化景象，

大同是北魏的都城，魏碑的发源地，被誉为魏碑之都。北魏在平城建都的时间最长，且北魏历史上为人称道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平城。平城时代是北魏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是魏碑书体的发祥地和源头。北魏平城百年间也是继东晋王羲之父子之后，我国书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

散布在云冈石窟深处的造像题记与平城时期的碑刻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涓涓细流的吉光片羽开创了波澜壮阔的洛阳魏碑书法艺术。大同魏碑艺术未受到王羲之一脉书风影响,在中国书法史上独树一帜，构成半部浓墨重彩的书法史。大同魏碑开启了浓墨重彩的书法发展史 。

魏碑是北魏盛行的一种刀刻斧凿书体，因此称“魏碑”，或“北碑体”，是碑刻、墓志铭、造像题记、摩崖石刻的总称。它是正书的一种，取代了隶书。魏碑透过刀锋看笔锋，书风古拙朴茂、庄重雄浑、苍劲峻厚、刚健质朴、硬朗开阔、棱角分明，其带有原生态的艺术特征为人称道。魏碑在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对隋唐楷书的形成影响巨大。唐代书法大家褚遂良、殴阳询、孙过庭的书品，很明显都是由魏碑演变而来，且烙印很深。北魏定都大同96 年，加上迁都洛阳前后南都北都之称，有 200 年之久。而北魏迁都洛阳短短数十年就灭亡，可人们每言魏碑必提洛阳。

大同魏碑和洛阳魏碑各自有什么特点？

（一）大同魏碑

大同云冈 11 窟作为魏碑体孕育期、萌芽期的代表作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十分重要。这是因为魏碑体的成熟期只有 40 多年，而其孕育期、萌芽期却长达 100 多年。而这 100 多年的孕育期、萌芽期恰恰就是在当时作为北魏王朝的文化政治中心———平城（大同市）度过，并且云冈石窟比龙门石窟早开凿多年，所以云冈石窟碑刻理所应当是研究魏碑书法孕育期、萌芽期的珍贵资料。

（二）洛阳魏碑

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当时都城洛阳文化艺术的灿烂辉煌，从流传后世的碑志上可见一斑。洛阳魏碑就内容性质而言，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佛教造像题记，多集中在龙门石窟；一类是世俗墓志，多集中在洛北邙山。龙门石窟造像，共有三千六百多块，经过长时期的风化侵蚀和人为破坏，现有二千余品，其中最著名的有龙门四品：始平公、孙秋生、杨大眼和魏灵藏。

“魏碑故里、天下大同”。大同魏碑开启了浓墨重彩的书法发展史，其学术意义与优秀价值无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亟待进一步深入挖掘。希望更多的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能积极投身到本次展览的书法创作中，把最优秀的作品展现出来，为全国掀起北魏书风起到带头作用，推动魏碑书法艺术在新时代不断传承、创新和发展。

（据微信公众号“山西广播电视台”）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张吉福在云冈石窟研究院调研

11月11日下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张吉福来到云冈石窟，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冈石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推进情况调研座谈。他强调，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笃定实干，遵循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胸怀感恩之心，肩负担当之责，把云冈石窟在保护的前提下，研究好，发展好，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以优异的成绩向党中央向总书记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回报党中央和总书记对我们的关怀厚爱。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崔巍，副市长郝献民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调研。

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山西省石质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张焯，云冈石窟研究院、山西省石质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党总支书记王雁翔，副院长、副主任何建国、崔晓霞及我院中层干部参加了调研座谈。

会上，张焯、王雁翔就半年来的各项工作推进情况和党的建设工作作了汇报。院领导和有关科室负责人作了表态发言。“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的叮嘱，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半年来，大同大学云冈学学院和云冈文化生态研究院挂牌成立、云冈研究院云冈保护中心正式启用、石质文物调查工作全面开展、10余个课题项目已向国家申报，云冈研究院机构重建积极推进…… “总书记来云冈石窟视察，为云冈带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 “作为云冈人，我们深深感到使命在肩、责任重大，一定要践行好总书记的嘱托。”

听取大家发言后，张吉福书记指出，把云冈石窟在保护的前提下，研究好、发展好，绽放出耀眼光芒，是我们的重大政治任务。大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进一步做好考古研究、本体保护、课题项目申报等工作，持续推进云冈石窟保护、研究、利用。要加强联络对接，积极争取国家和省重点课题、重大项目和专项资金支持。要加快机构重建，理顺体制机制，科学设置部门，建好带好队伍。要加强学术交流合作，推进一流学术期刊建设，占领学术高地。要创新人才机制，积极探索与北京大学、山西大学等高校联合办学，为研究云冈学提供人才支撑。要在做好对云冈石窟精细化保护的同时，深入挖掘其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做好文旅、文创、文艺融合文章，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据微信公众号“云冈石窟官微”）

《学习强国》平台刊发云冈石窟200多篇相关文章视频累计阅读量730多万人次

过去一年多来，《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刊发云冈石窟相关文章203篇，22个视频，累计阅读量近730万人次，点赞数量颇高，有效宣传推介了云冈石窟景区。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是由中宣部主管，以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立足全体党员、面向全社会的优质平台。自平台上线以来，云冈石窟研究院党总支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全院党员干部群众在《学习强国》平台开展学习。

云冈石窟研究院坚持党管宣传原则，近年来高度重视宣传弘扬工作，通过自有的官方微信、官方网站、官方微博等互联网手机客户端平台进行景区宣传，及时报道云冈石窟在研究、保护、管理、弘扬等各方面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累计发布5000多条500多万字。中央、省市各大媒体也刊播了众多的云冈石窟的内容。过去一年多来，《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相继发布了200多篇，其中刊用了云冈石窟官微70多篇亮点宣传文章，让更多人了解云冈，了解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感悟中华优秀文化。让云冈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进云冈。

（据微信公众号“云冈石窟官微”）

作为资源的文化遗产

□杭侃

英国有一本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的教科书《文化和自然遗产：批判性思路》，书的序言指出遗产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关乎过去，而是我们与现在、未来的关系，其中，“我们的选择犹如一面镜子，映照着我们在当代所持并希冀能带进未来的某种价值体系”。

当前，文化遗产之所以越来越受到重视，是因为文化遗产是一种特殊的资源，而这种资源不可再生，我们有义务完成代际之间的传承。因此，任何对文化遗产资源的利用都应当以保护为前提。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问题的另外一面，就是片面地强调保护，而忽视它的资源属性。近几十年的实践表明，由于没有综合考虑到国计民生和中国文化遗产的特性，文化遗产还没有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加以充分利用，一些部门甚至将文化遗产当成社会发展的一种羁绊，口头上谁都不会说不保护文化遗产，但实际的保护效果并不理想。

要切实保护和利用好文化遗产资源，就需要认识其价值。《世界遗产公约》强调了文化遗产在历史、艺术、科学方面的价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当中的人，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最容易被感知。对于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更重要的是通过了解前人的智慧，培养公众的科学精神。对于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科技在飞速进步，但艺术的情况却有所不同，许多原始艺术也很具有当代性。

关于文化遗产的价值，近些年来学界又提出了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等，虽然尚有争论，但反映出社会对于文化遗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有助于建立文化自信。记得住乡愁，是文化遗产在社会认同方面的价值。而对于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有部分专家是讳言的。

笔者以为，只有真正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我们才能更好地加以利用。文化遗产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所以，对于文化遗产的利用，不能仅仅关注文化旅游一途。现在文化遗产的利用似乎成了时尚，文创成了热词，但是，繁华的背后有许多落寞。文化遗产与当今社会有时空的隔膜，要想

利用好文化遗产资源并非易事。尚刚教授曾直言，“工艺美术行业被设计的乱象缠绕，大抵有两种：沉迷仿古、妄自出新”，指出“文化修养影响着设计的品质”。

明代江南有不少优雅隽永的佳作，何以如此？明清之际的张岱在《夜航船》的序里留下一段文字，可供我们索解：“唯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而未尝少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橱。”当时的手艺人“无不读书”而有“学问之富”。文化遗产的利用，首先要求利用者有文化，而不只是简单运用什么元素。

王国维先生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中认为，“古雅之能力，能由修养而得之，故可为美育普及之津梁”，同样强调了文化修养对于理解“古雅”的津梁作用。可见，文化修养的培育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任重而道远！

（据《学习时报》，
2019 年 1 月 4 日第 006 版）

云冈石窟是如何开凿的？

□张靖

中国人无比钟爱木头，他们用木头建造精美的宫殿庙宇，也用木头制作日常生活所需。即使无数次大火让那耀眼的木结构都化为灰烬，也没有磨灭过中国人对木结构的热情，这让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旗帜鲜明，独树一帜。

不过，中国人也尝试过让建筑成为永恒的艺术。如今散布在中国大地上的上百处石窟寺，就是最好的证明。在这遍布大地的石窟寺中，有一处最为与众不同，那就是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不同于其他的石窟，云冈石窟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次以皇家的力量主持开凿的。在长达一千多米的崖面上，开凿有大小洞窟 200 多个，其中大窟 45 个，造像多达 51000 多尊。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凿出如此精美的雕刻呢？让我们穿越时空的距离，回到那动荡无比，又熠熠生辉的年代。

公元三世纪，发源于大兴安岭深处的鲜卑民族不断地挥鞭南下，一百年后，部落其中的一支——拓跋部崛起，逐步统一了北方地区。这时候的中原王朝正处在改朝换代的慌乱之中，忙得不可开交。拓跋部看准了时机，于公元四世纪末建立北魏



王朝，并将首都定在了平城（今山西大同）。在这个关键时刻，北魏的建国让平城成了新的焦点。贵族、僧侣、工匠、商贾、文人学士等各地的精英从四面八方赶来，平城从一个边陲小县跃升为北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接着北魏向西挺进，先后征服北凉和西域，并从凉州虏掠来大量的佛教僧侣和擅长雕刻技艺的能工巧匠，平城一时间升级为百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与此同时，一个名叫法果的和尚为了弘扬佛法，带头拜见皇帝，并宣称“皇帝就是当今如来”。这一思想像是不谋而合的一剂良药，促成了北魏政权与佛教的联姻，平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华佛教的新中心。

一系列举动，给当时的社会精英们创造了广阔无边的舞台，他们压抑已久的聪明才智即将迸发。公元460年，高僧昙曜延续法果的思想，在平成（大同）西侧的武州山上为北魏最初的五位皇帝开凿了5座大窟，从此，便拉开了云冈石窟开凿的序幕。

早期的五座大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窟内以大佛为主体，众弟子环绕四周，因此被称为“大佛窟”。由于大窟体量太大，距离地面又高，开窟难度较大，开凿时先在上部开凿明窗，将大佛头部周围的石料从明窗运出，接着逐次向下开凿，这样可减小造像的难度，降低危险系数。由于北魏对西域的开拓使中国迎来了第二次东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大量西域的艺术形式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东端的大都会平城。因此，这一时期的造像带有明显的西方造像特征，他们方额丰颐、高鼻深目、细目长眉、大耳垂肩、面容饱满、身材挺拔健硕。在这些大佛身上，我们能看到起源于遥远希腊的犍陀罗造像艺术，也能看到起源于印度的笈多造像艺术。一时间，世界各地的雕刻艺术精华在这里完美地融为一体。云冈的工匠们使用东西结合的手法，将鲜卑民族粗犷的气度表现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昙曜五窟的开凿，掀起了云冈石窟建造的热潮，云冈即将进入石窟营造的全盛期。

在皇家的主持下，石窟营建上升到国家意志。建设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并加快了开凿的步伐。在短短四十年里，就完成



了所有大窟大像的开凿。中期洞窟的雕刻内容更加的丰富多元，除了人物故事题材之外，还出现了大量的装饰纹样。在这繁复的雕刻纹饰中，有源于古希腊的建筑样式，如爱奥尼亚柱式；有源于波斯的兽形柱头；也有中国木结构建筑中的斗拱与飞檐；还有起源于印度，与中国木结构楼阁结合形成的中国佛塔雕刻；也开始出现了褒衣博带的汉式服饰。在人物与建筑之间，雕刻着大量来自西方的，以植物和几何线条为主的装饰纹样。这些华丽的装饰，与之前以动物为主的中国传统纹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系列的变化，使云冈不光成为了佛的殿堂，还成为了艺术的殿堂。云冈石窟迎来了它最光彩的时刻。

为了让鲜卑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在云冈石窟建造的同时，北魏王朝逐步施行着一系列汉化政策。为了使汉化更加的彻底，孝文帝于公元 494 年迁都洛阳，原来大量的僧侣及能工巧匠大部分随迁到洛阳，建造龙门石窟，平城由首都变为北都。皇家对云冈的经营逐渐进入了尾声，而民间开窟造像的余波还在延续。这一阶段的石窟营造逐渐趋于小体量而大数量，崖壁上排布着密集的小窟龛，造像的风格开始趋于模式化，佛像的身形更加的秀骨清像，一个个表情温和的佛像，给人清心寡欲、超凡脱俗、与世无争的感觉，这种造型似乎更接近中国人心目中对神仙的想象。至此，云冈石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留下一篇伟大的乐章，铭刻在武州山的山崖上。



经过千年风雨的洗刷，一些佛像外表已经荡然无存，但风骨依旧不减。正如最初建造者们所期望的那样，云冈石窟历经千年，似乎要与天地同久长。

云冈石窟的开凿，代表着公元 5 世纪世界雕刻艺术与石窟开凿技术的最高水平，其融汇与创新的方法论，为后世不断沿用，成为后来中国石窟寺开凿的样板，甚至反向影响了早于其开凿的敦煌石窟。石窟艺术的中国化，在这里得到了演进与加速，并对中国后来的石窟与造像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北魏统治的 100 多年时间里，云冈石窟成了中华佛教当之无愧的圣地。石窟的开凿用时虽然只有 60 多年，但其创造的文明成果却传承千年。

如果说莫高窟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那么云冈石窟就是晋北高原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它的光芒盖过了它的本身，波及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甚至漂洋过海远达日本。这一切的光芒都源自一种巨大的力量，它既是碰撞的力量，也是融合的力量。如今，敦煌莫高窟已经以“敦煌学”走向世界，云冈石窟将面临的问题是：路在何方？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云冈学”将带着巨大的能量，走向世界。

（据微信公众号“可视化星球”）

书刊推荐

《争膺天命：北魏华夏天神祭祀考论》

作者：赵永磊
《历史研究》2020 年第 4 期

华夏郊天礼是北魏膺承天命与彰显正统性的重要仪式。道武帝通过行华夏即位礼与郊祀礼来彰显正统性，与十六国无本质区别。天兴初年设立的郊祀制度与郑玄礼说并不完全契合，且明显有异于两晋十六国所从王肃“郊丘合一”说，传达出与东晋争衡的明显姿态。孝文帝依托郑玄“郊丘为二”说改定郊祀制度，实现郊祀礼由有司摄事到皇帝亲祀的转变，并废止西郊郊天的鲜卑旧礼，最终确立华夏郊天礼的独尊地位。迁都洛阳后，孝文帝通过行圆丘祭礼宣示天命在魏，与南朝争夺正统的态势臻于极盛。北魏正统观念主要表现出仿魏承汉与承继西晋两个面向，其郊庙制度更近于曹魏明帝景初元年以后之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北魏超越两晋南朝、直追曹魏的心态。

守护好石窟寺这份艺术珍宝

□杨雪梅

数量众多的石窟寺是我国传承脉络清晰、关联性密切、体系完整的历史文物遗存，也是真实性、完整性保存最好的文物类别，在我国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文化遗产中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类型。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莫高窟、大足石刻……无一不是让我们魂牵梦萦的艺术珍宝。

10 月 23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加大石窟寺抢救性保护力度、建立石窟寺安全长效机制、规范石窟寺旅游开发活动等 10 项主要任务。《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2 年，石窟寺重大险情全面消除，重点石窟寺安防设施全覆盖，到“十四五”末，石窟寺保护利用水平显著提升，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强。

这样的《指导意见》是前所未有的。

1941 年至 1943 年画家张大千赴敦煌莫高窟对洞窟进行了调查、断代、编号、壁画描摹和展览宣传，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常书鸿于 1944 年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这是我国第一个依托石窟寺建立的文物保护机构。1940 年 1 月 17 日至 21 日，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等考察大足石刻，后来又将“大足石刻”介绍给国际学术界。1941 年 5 月，冯国瑞考察麦积山石窟，首编《麦积山石窟志》。1943 年秋，王子云任团长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考察麦积山石窟，进行首次摄像建档活动，使麦积山石窟得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关注……20 世纪 40 年代有识之士的考察、研究、呼吁等活动，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石窟寺保护工作得以重视的基础。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石窟寺保护已经历了 70 余年的发展历程，工作和成果基本上代表了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水平，保护理念在实践中逐渐完善成熟；多学科融合的保护科技支撑模式和技术体系基本成熟；一些石窟寺重大保护工作及其成果在我国文物保护发展历程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涉及以敦煌石窟为代表的“中国特色，敦煌经验”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尤其是 90 年代初期，我国石窟寺抢救性保护工作全面展开，石窟寺保存状态大大改善，保护工作内容更加丰富。1989 年至 1999 年，敦煌石

窟针对窟顶戈壁沙害，探索开展了工程治沙、生物治沙、化学治沙等综合性科学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效果。1993 年至 2002 年，敦煌研究院与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精密光学机械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等合作开展壁画数字化技术、数字敦煌研究工作，为数字敦煌建设奠定了基础……

根据《指导意见》，各地石窟寺已经开展保护情况的调查。这些年石窟寺数字化保护利用一直在推进中，需要加快制定相关标准规范，促进数字资源的管理和共享共用。近日，国家文物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石窟寺等文物开放管理和实行游客承载量公告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就加强石窟寺保护管理做了更为细致的安排。核定、公布石窟寺景区游客承载量和重点洞窟的最大瞬时容量，推广预约参观制，这无疑将使石窟寺的管理更为科学，游客的参观更为有序，是着眼于长久的前瞻之举。

石窟寺虽然看起来坚如磐石，但历经千年，在柔韧的水、尖利的风以及热胀冷缩、虫咬蚁蛀的磨蚀、淘空下，大多面临结构失稳、水害侵蚀、风化破坏等顽症的折磨，特别是许多中小石窟尚未得到全面有效的保护。如同大夫治病，石窟寺保护不仅要正确诊断，更要对症下药、有药可医。

珍贵的文物，需要一代又一代文物工作者的倾情守护。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敦煌莫高人铸就的“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是我国石窟人守护石窟、守护文明的代表。其实这样的名字可以列很长，很多人是我们所不熟悉的，是他们开创了我国石窟寺保护的壮丽事业，而未来，需要更多的后继者继承这样的精神，将这份艺术瑰宝传之久远。

（据《人民日报》2020 年 11 月 14 日第 05 版）



编者按

本期同仁学术栏目刊布了云冈学研究院张庆捷教授、孙家洲教授、韦正教授三位特聘研究员的最新研究成果。三位特聘研究员简介如下：

张庆捷，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前所长、书记，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汉唐考古学与历史研究方向。

孙家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

韦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考古与美术研究。三位学者为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首批特聘研究员。

可汗祠探源

□张庆捷

【摘要】山西介休、灵石、石楼、中阳和汾阳等市县，存在多座可汗祠或遗迹。魏晋时期，鲜卑诸族始见“可汗”之称。唐代起，绛州（运城新绛县）出现纪念斛律光的影堂，后扩建成祠庙。考察可汗祠，初建于唐，因此可汗祠供奉的对象当是唐代或北朝人。在此区域和时段中，流芳千年并被各族诚心供奉者，细观活动于该区域的游牧民族首领，达到“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捍大患”诸祭祀标准的，唯有附属鲜卑的敕勒人斛律光，他应是这一带可汗祠供奉的可汗。可汗祠是游牧民族英雄崇拜和汉族建庙祭祀礼俗的自然结合，历经千载而不废，成为见证古代民族大融合的鲜活实例。

古代山西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区，又是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地区，两者结合，决定了古代建筑遗产带有鲜明的民族多元特色。介休市祆神楼就是绝无仅有的一例，姜伯勤先生曾对它作过考察研究。下面我们探讨的可汗祠在全国也属凤毛麟角之例。关于可汗祠，以前无人研究，近年随着北方民族文化研究的深入，关心它的人越来越多，提出了一些疑问，如可汗祠建于何时？供奉对象是谁？对此，曾有几位学者作过探讨，或认为供奉对象是高欢及其“朔州军人”，或断言是隋末刘武周，或分析是初唐时期的突厥人突利可汗什钵苾，也有人推测是北齐名将斛律光。其中有一点共识，即可汗乃北地游牧民族名号，供奉对象是游牧民族首领。可汗祠关系到古代北方民族融合大背景，弄清可汗祠建立的时代和供奉对象，对研究古代民族融合，无疑有很大意义。

可汗祠，俗称可汗庙，顾名思义，供奉对象是一位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可汗。以往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到张壁可汗祠，虽有开拓研究之功，然视野狭窄，资料收集和研究结果不免大打折扣，没有回答出

可汗祠创建时间和分布范围。对于供奉何人？也是见仁见智，难以令人信服。

山西介休、灵石、石楼、中阳和汾阳等地，存在多座可汗祠或遗迹。我们于2011—2018年数次实地调查，发现这些可汗祠已不是最初建筑，庙里碑文明确记载，屡次经过重修或重建。殿内原初塑像早已坍毁，现存殿内或者没有塑像，或者是现代塑像，从塑像身上难以找到最初的线索。幸亏几座可汗祠都或多或少留存修寺或补建碑刻，仔细阅读遗碑，主要记载重修重建情况，但并未记载供奉对象是谁，祠庙创建何时。碑文字里行间隐约透露，可汗祠初建时间比较遥远。想窥视原貌，需要排查勾稽，作一番穿越历史的探寻。

围绕可汗名号出现和流传，可汗祠创建时间及供奉对象，经过追索现存几个可汗祠的碑文以及对斛律光民族属性、时代、活动地域、事迹、后人分布范围和斛律寺庙的探讨，可以得出初步结论。

一是通过对介休、灵石和中阳等地可汗祠遗存碑文考察分析，可以得出其创建时间与地方志记载的斛律王庙相同，都是唐代。延续到宋金时，可汗祠开始破损补修，逐渐远离民众视野，以致到元代，已无人说出准确创建时间和供奉对象。延续到明代，可汗祠才改称可罕龙王庙或龙天可汗祠。其间变化，与北方游牧民族盛衰有关，特别是与鲜卑族或斛律部的衰落和汉化有关。

二是可汗祠的供奉对象，因为缺乏直接信据，只能依靠现有资料分析。从地域分析，斛律王庙和可汗祠主要分布于北至并州晋阳、南至绛州稷山之间的城市乡村，可见供奉对象在此区域影响极大；特别是可汗祠延续千载之久，宋代还得到敕封，证明供奉对象是一个深得北族和汉族衷心尊敬的首领。在此区域和时段，能存在千年并被各族诚心供奉者，细数北朝唐代该区域游牧民族首领，能达到“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捍大患”诸祭祀标准的，应该就是附属鲜卑的敕勒人斛律光。

三是可汗祠无疑与鲜卑或附属鲜卑的北方游牧民族有关，是民族融合的体现和结晶，是游牧民族英雄崇拜和汉族建庙祭祀礼俗的自然结合。山西是鲜卑及其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活动地区，留存着许多鲜卑及其附属北方游牧民族的遗迹遗物，可汗祠只是其中之一。可汗祠与斛律王庙供奉对象相同，称呼有异，晋阳的称为斛律寺，绛州的称为斛律王庙，稷山的称为斛律公祠，介休、灵石、石楼、汾阳和中阳的称为可汗祠。凡是称“可汗祠”者，理应是游牧部落建造，反之，则由汉族建造。诸地民族不同，名称有异，显露出不同民族的信仰存在一定隔阂，也反映出各民族对忠臣良将的功、德评判标准几近相同，成为各民族联结相融的思想基础，自发地建庙立祠，既为纪念忠臣良将斛律光，也为弘扬超越于民族之上的人间正气。

四是可汗祠是古代民族融合的文化遗存，有必要加大保护力度，不能任由它默默消失。现存山西几座可汗祠，屡经劫难留传下来，历经千载而不废，是中古民族融合的碑记。虽然多数在明代改为可汗龙王庙，加入更多中原汉民族的多元信仰元素，然而仍然保存着原貌的印记。相信它们的存在，会使学界对发生在古代北方的民族大融合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

（节选自《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

荀子“论秦国内政”再审视

□孙家洲　李重蓉

【摘要】《荀子》中的《强国》和《儒效》两篇文献，记载了荀子“游秦”时对秦国内政的判断。学术界此前的解读多视其为荀子对秦国内政的肯定和赞美。实际上，秦国统治集团的高层对荀子入秦特别重视，也就有了官方“作秀”的可能。荀子眼中所见的秦政之美，不见得符合全部真相，可能只是秦国愿意示人的“表象”；荀子所论秦内政之美，就某些判断标准而言，与孔孟之道确实有所不同；而且还有“主宾答对”的特定背景，荀子赞美秦政也可以从“应对之语”的人之常情得到理解；荀子直言秦国内政的根本缺陷是“无儒”，体现出他秉执儒家学说的坚定立场，不失其学术宗师的风范。《荀子·议兵》篇保留了荀子对秦国内政的另外一段论断，批判堪称犀利。这是荀子在赵国的议论，环境超脱，也就更能够代表他的真实观点。

《荀子》中的《强国》和《儒效》两篇文献，记载了荀子西行入秦的历史事件，荀子在实地考察秦国之后，应约对秦国内政作了即席评论。在荀子思想研究和秦国政治史研究两个领域，荀子“论秦国内政”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关于荀子及其思想研究和历史定位，历代学者多有论述，结论也有诸多不同。笔者极为服膺韦政通的一个比喻之说：“如果要用一个观念来象征孔、孟、荀的人格，并且还能表现出他们之间的差别，我们可以笼统地说：孔子是仁者，孟子是义者，荀子是智者。”笔者认为，要解读上面所说的问题，同样不应忘记荀子是“智者”的人格定位。被认为荀子“肯定”秦国政治的某些说辞，笔者认为应该从学理诠释和“人之常情”两个方面对之作出更为全面的理解及申述。

荀子西行入秦（此行对于荀子弟子李斯后来的入秦必有相当的影响）之时，正是秦昭王重用范雎辅政，秦国处于鼎盛时期。当秉国辅政大臣应侯范雎当面询问：“入秦何见？”荀子就回答了如下一段名言：“其固塞险，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

不朋党，偶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諰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偶偶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显然，“秦四世有胜”是荀子对秦国历史与现实情况所作观察的基本结论，而何以导致这个优势局面出现，是荀子要追究的原因，也是他必须面对的问题。荀子给出的答案，分成几个层次。

我们回顾荀子这段讨论秦国政治的论断，开篇是在讲述政治地缘的优势，随即分别讨论了民风、吏风、朝廷政风，形成了“古之民也”“古之吏也”和“古之朝也”的一组对应性的判断。由此完成了对秦国内政的三重礼赞。由于语句形式上的叠加和重复，给人以很强的印象。这段话，除了最后一句说秦国“无儒”为其所短之外，其余都在大力赞扬秦国之长。应该怎样看待荀子对秦政的赞扬？特别是其中某些显然是赞扬“过头”的问题？笔者的基本想法是：我们必须注意荀子答语的两个“语境”问题：

其一，荀子的身份，是到访秦国的“来客”，他此次到访的时间多长以及到过何处做过实地考察，均无具体的历史记载。荀子入秦之后的“考察路线”，是出于荀子的“自行安排”，还是由秦国官方出面接待而作出的“规定性”安排？我们其实并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从一般常情来推测，秦国高层越是重视荀子的来访，就越会“周密”地作出官方的安排。不论是为了表达对来访大学者的款待善意，还是出于对他“随意游走”可能带来弊端的防范，秦人绝不会允许荀子一行“自行考察”。正因为如此，荀子在秦国所能看到的，一定是秦国统治者愿意让他看到的场景。荀子本人大概很难有完全自主的路线选择。一如现在“国际互访”中的官方安排。所以，荀子较多看到的是秦国“好”的一面，甚至不乏是官方安排的“作秀表演”的一面。

其二，荀子是在当面答复主人的对“入秦所见”时所说的话，甚至我们可以猜测是在应侯盛情款待的宴席上宾主之间的问答之语。出于对主人的尊重或者是可以理解的“客套”，荀子对秦国政治局面多说几句“捧场话”，实在是千古相通的人之常情。

如果以上谈及的“语境”两题大致不误，笔者认为对荀子的这段论述秦国内政的著名言论，就总体判断而言，当有如下认识：1. 荀子眼中所见的秦政之美，不见得符合历史的全部真相；他所见到的很可能只是秦国愿意示人的“表象”。2. 荀子的三层赞美，不能作为儒家学派对秦国内政的全面肯定，而只是荀子个人在主宾酬答时的应对之语。荀子在对话中表现出来的价值判断，有几个层面都与孔孟儒学的“上古之美”有相当的差异（分析见上述）。其中除了可以理解的“人情之常”这个因素之外，或许还表现出荀子在政治理想设计方面，确实存在与孔孟之学有所不同的标准与内涵。3. 在如此主宾酬对的场合，面对威势显赫的秦国执政应侯范雎，荀子依然直言秦国内政的根本性缺陷“无儒”，体现出的是荀子秉执儒家学说的坚定立场，

不失其学术宗师的风范。此语也道出了秦国内政的实际状态。如果确立了对荀子论秦政的如上基本判断，他的分析就可以作为我们认识秦国内政的参考文献。

荀子是有着强烈的“用世”意识的。荀子此次“游秦”的大体背景是：他在齐国遭到冷遇，是“失意”之中带着“无奈”之意而入秦的。而在“游秦”之后不久，荀子又回到了自己的出生之地——赵国，《荀子·议兵》篇有“临武君与孙卿子议兵于赵孝成王前”的记载。他对秦国内政的论说带有延续性，更为真实的内心判断，不在《强国》篇而在于《议兵》篇。

如前所述，荀子是一位急于用世的学者，因为不得志而离齐游秦，其后又返赵论兵，最后到了楚国，在春申君黄歇秉国当政的背景之下任兰陵令。史称：“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兰陵，只是楚国的一个县，以荀子的鼎鼎大名而使其主一县之政，无疑是大材小用。但荀子却欣然赴任。其用世之心何等急迫，不难想见。荀子入楚，不得不依附于春申君黄歇，与他游秦之时不得不倚重应侯范雎，其中情势如出一辙。由此及彼地推论，急于用世的荀子，游秦之后而入赵，说明他“游秦”的本愿未能达成；出赵而入楚，也可以理解为他在赵国也没有如愿受到重用。如此看来，秦昭王与应侯，赵孝成王与临武君，不论表面上对荀子如何敬重和礼遇，然都不曾准备给他提供一个高级官位，使他可以施展所学。荀子不获重用的原因，除了已经高居政枢者的嫉贤妒能之外，最大的可能性是：荀子所提供的政治理念，其实不为当时的统治者真心欣赏。由此可以推断：荀子入秦之时，很可能是希望在秦国得到重用；他在秦昭王和应侯范雎面前的答问之辞，也是展示胸中学识、希望得到赏识和重用的一种努力；所以其中有“美誉”秦政的部分，读者如能设身处地，当可理解其中情由。尽管如此“俯就”，荀子却依然无法得志于秦国，只能黯然离境。这可以说明，荀子的政治设计、论政模式，与秦国统治集团的需求，并不投契。当我们以如此思路来回看《强国》和《儒效》两篇文献时，就容易理解荀子讨论秦政的个中原委和初衷所在，也就应该更全面地理解他的本意——不应再简单地以“赞赏秦政”来概括荀子之说，更不能以此作为时人歌颂秦政的依据。

（节选自《河北学刊》2020年第6期）

也谈佛教造像的长安模式

□韦正　马铭悦

【摘要】学界对于长安模式的内涵历来有着不同解读。文章主张，佛教造像的长安模式确立于北周时期，虽然长安地区北周佛教造像的特征吸收了其他地区，特别是成都地区南朝造像的因素，但其基本形体特征来源于北周时期长安本地的自我创造，即比拟了鲜卑显贵乃至皇帝的形体特征塑造而成。这与北魏政权崩溃后东西方同时出现的鲜卑化运动直接相关。隋唐时期长安地区佛像亦可称之为长安模式，但与北周长安模式有着阶段性的差异。

文献记载表明，长安在中国中古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过，长安缺少佛教石窟，佛教造像的发现有限，如何评估已有的考古发现，进而通过考古发现探讨长安佛教的具体发展状况成为一项颇有意义的工作。在以往的研究中，部分学者提出佛教造像的“长安模式”这个概念，但对其内涵存在不同意见，本文拟对这些意见作简单检讨，并对长安模式的出现时间、具体表现、因素来源等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学界。

一、“长安模式”内涵的变迁

“模式”是结构主义者发明的词语，本意是说明事物结构的主观理性形式。“模式”概念的运用促进了对研究对象的宏观把握，既是理论思考的进步，也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进步。“模式”概念在中国考古学中的运用是受到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影响的产物。严格地说，“模式”的影响应该在地域范围和时间长度上都有明显表现。具体到佛教造像，某种造像形式在某地被创造出来后，能够流传到较远地区，并能维持一定时间长度，这样的造像形式才有被称为“模式”的资格。

“长安模式”的问题比较复杂，内涵经历了不同解读。李淞最早提出“长安模式”这个概念，具体内容是“佛道并存”“邑团造像”“胡汉交融”“传统样式与民间趣味”。尽管李淞“长安模式”的内涵难以采信，但“长安模式”的提出启发了后来学者。罗宏才对李淞的“长安模式”既支持又修正，论述立足于长时段，但并无太多的西晋十六国实物材料可资利用，

而且所注重的是雕刻技法，并未涉及西晋十六国北朝长安造像的总体特征和对外影响。裴建明接受李淞“长安模式”存在于北朝时期的时间判断，但对“长安模式”的内涵几乎进行了全盘更换，他强调的内容有三个方面。裴建明所论三点都是事实，但北朝长安造像的特点和对外影响并没有得到充分说明。因此，裴建明讨论的核心不是“模式”本身而是长安佛教的重要程度。

尽管观点也不一致，但更多学者将长安模式的存在时段从北朝挪到隋唐时期，其中常青、冈田健、王建新、冉万里是代表性学者，尤其是王建新与冉万里都进行了正面和充分的论述。王建新直截了当地说：“佛教造像的长安模式开始出现于唐太宗贞观后期和高宗初期……新的造像模式在长安地区出现后，逐渐传播到全国，并形成造型艺术的盛唐风格。”冉万里像王建新一样，注重长安在隋唐时期的首都地位和对外影响，但是冉万里似乎比较悲观，他认为由于材料公布不完全、研究方法不尽恰当，导致长安地区造像与其他地区的对比无法全面、客观地进行，从而造成了“唐代长安地区佛教造像的样式，也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长安模式’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模糊而又不清晰的概念”。冉万里与王建新对长安模式存在的时间、基本特定和对外影响的看法是相似的。二位学者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认同长安模式从唐代开始。这一点本文有不同意见，而是倾向于常青和赵力光的意见。

常青和赵力光都主张长安模式的时间要早，但具体意见略有差异。常青早年就指出“（以长安为中心的）新型佛像在北周初年即已形成，而长安应居于这种作风



1　2　3

· 图一 北周造像

1. 西安草滩出土一佛二弟子造像龛（《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第 68 页）2. 西安灞桥湾子村出土佛立像（《长安佛韵———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艺术》，第 95 页）3. 西安中查村出土 4 号佛像（《古都遗珍——长安城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图版一七）

在北周境内传播的中心区域”，而且他还说“北周不同于北魏的新型佛像风格，在西魏时期即显雏形”。本文认为北周不是长安模式的初期而是确立时期，将长安模式提前到西魏比较困难。

二、北周确立长安模式

对长安模式具体出现时间的认定牵涉到对长安造像总体性质的把握。长安模式在北周时期确立的依据在于：北周长安造像第一次建立了明确的地域特征，并对外产生显著影响。虽然已发现的北周长安造像数量不多，但表现出比较一致的新时代特点，这为很多学者所认同。北周长安造像类型变化不大，似乎四面造像碑数量增加，有些制成单层佛塔状。造像题材上的变化要大一些，从北魏平城时代就流行的七佛、维摩文殊对坐、释迦多宝并坐以及交脚弥勒菩萨都变少了。倚坐弥勒佛较为常见，四面造像碑上多见外，背屏式造像中也有。表现形式上的变化最大，从十六国时期已存在的关中特色的密集平行线条纹造像基本不见了，代之以新形式。

北周长安造像的对外影响可从石窟和单体造像两个方面加以说明。石窟方面：固原须弥山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武山拉梢寺石窟、广元皇泽寺石窟都有表现。广元皇泽寺石窟的情况与前三处石窟有所不同，定为北周时期的仅有第 15 窟，且该窟主尊为北魏以来的褒衣博带式，胁侍菩萨才是北周样式，这种北周与北魏样式的混合，折射出北周时期广元地区的复杂形势。须弥山等三窟的规模都很大，材料也很容易得见，这里不展开叙述。北周长安造像对其他地区单体造像方面的影响，常青早年也有陈说：“1974 年 4 月，在西安北郊出土的一批白石造像中的坐像，以及龛形、佛、力士等像的布局特征，与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出土的北周建德二年（573）王令猥造像碑十分相近。此外，类似的丰硕形佛像也见于洛川县土基公社鄜城村发现的建德二年郭乱颐造像碑，严家庄出土的建德三年杨广娼造像碑；甘肃正宁出土的保定元年（561）刘归绵造像；山西安邑县出土的保定二年（562）陈海（龙）等造四面像。综上可以推论，这种新型佛像（指低髻方面、头大身短的佛像）在北周初年即已形成，而长安应居于这种作风在北周境内传播的中心区域。”常青列举的只是一部分，实际上各地有更多的发现，距长安近者如长武博物馆北周造像，远者如太原山西省艺术博物馆所藏来自山西南部地区的造像。北周长安造像深受成都地区南朝造像影响，但不是一味的接受，而是对南方也有影响。

因此，从地域特征和对外影响两方面看，佛教造像的长安模式在北周时期已经确立。



· 图二 广元皇泽寺石窟第 15 窟正壁（部分）
（《广元石窟艺术》，第 51 页）



· 图三 成都出土梁中大通元年（529）
景光及景焕母子造释迦立像
《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第 21 页）

三、长安模式的来源

北周造像长安模式的来源以往关注于南朝成都地区、笈多艺术，偶及东魏北齐，本文认为笈多艺术与北周长安模式没有直接关系，长安本地的自我创造可予考虑。

北周长安造像的细部特征的确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追溯到很多地区，但北周长安造像肯定不是很多地区造像细节的拼凑，采用因素分解、分头追寻的方法不合适，尤其是在面对北周造像的新因素新样式时。以往研究都注意到北周造像不合比例，但迄今没有正面解释。本文以为，北周造像的这种形体特征系北周独创，其渊源不在佛教造像，而在于北周贵族乃至皇帝，造像是按照他们的形体特征而塑造的。将佛像按照鲜卑显贵乃至皇帝形象塑造，还有时代方面的因素。按照本文的理解，鲜卑化是洛阳北魏政权崩溃后北中国东西部同时发生的现象，在考古现象上，从陶俑、壁画延伸至佛教石窟、单体造像，北周佛教造像的形体特征不过是其中的一端而已。

小结

北周时期长安地区第一次出现了地域特征鲜明的佛教造像，并且明确影响到其他地区，因此可称之为“长安模式”。长安地区北周佛教造像的特征吸收了其他地区，特别是成都地区南朝造像的因素，但基本形体特征是北周时期在长安地区自主出现的。北周造像，特别是佛像，再现了鲜卑显贵乃至皇帝的形体特征。这与北魏政权崩溃后东西方同时出现的鲜卑化运动有直接关系，是云冈昙曜五窟大体按照皇帝形象塑造佛像的异代重现。北周长安造像的些微特征在西魏末期有所露头，但长安西魏造像的基本特征还是北魏式的。北周长安造像的对外影响在石窟寺和单体造像方面都有表现。隋唐时期长安地区佛像同样既有鲜明地域特色，也对外产生很大影响，同样可以称之为“长安模式”。隋唐时期长安造像的特征在吸收北周特点的基础上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隋唐“长安模式”与北周“长安模式”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可以视为“长安模式”的阶段性差异。这种现象在其他地区如北魏平城或隋唐洛阳也存在，只是不如长安地区表现得那样瞩目，这正可以视为长安模式特别具有活力和内涵深刻的表现。

（节选自《敦煌研究》2020 年第 3 期）

日本云冈石窟研究著作目录（一）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时间
雲岡石窟	新海竹太郎 中川忠順	文求堂書店	大正 10 年
支那山西省大同石仏寫真集解說	田中俊逸	東洋古美術研究會	大正 11 年
大同石仏寺	木下杢太郎　木村荘八	日本美術学院	大正 11 年
極東の三大芸術 －（雲崗の石窟寺・吐含山の釈迦・法隆寺の壁画）	小野玄妙	丙午出版	大正 13 年
雲岡大石窟	佐藤孝任	華北出版社	大正 13 年
大同石仏について	中井宗太郎	市川美術図書出版部	1925 年
支那の建築	伊藤清造	大阪屋號書店	1929 年
考古遊記	濱田青陵（濱田耕作）	刀江書院	1929 年
震旦舊蹟圖彙 雲岡石窟	田邊泰解說 山本明攝影	山本明寫眞場	1933 年
大同石佛寺	木下杢太郎 山本明攝影	座右寶刊行會	1938 年
石佛：大同一瞥と	福島圓明	福島圓明	1938 年
支那の建築と藝術	關野貞	岩波書店	1938 年
大同附近遺蹟調查概報	原田淑人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B 05015885100（電子資源,現已公開）	1939 年
支那文化史跡	常盤大定 關野貞	法藏館	1939 年
蒙古案内記 附 大同石佛案内記	岩崎継生	蒙疆新聞社	1939 年
東洋古美術の豪華——大同雲岡之石佛	山本隆太郎	晉北自治政府	1939 年
大同石佛案内記	安藤德器	寶雲舍	1939 年
大同雲崗石佛写真帖	山本隆太郎	大同山本写真館	1939 年
雲岡の石窟とその時代	水野清一	冨山房	1939 年
支那建築の拱に関する一考察　附雲岡第九窟門形は闍か	飯田須賀斯		1940 年

（重刊）大同石仏寺	木下杢太郎	座右宝刊行会	1941 年
アルス文化叢書 14　大同の石仏	小川晴陽	アルス	1941 年
北支（4-11 山西省特集）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	1942 年
大同雲岡の石窟	小川晴暘	日光書院	1944 年
雲岡石窟群（東方文化研究所調査概報）	水野清一　羽舘易撮影	朝日新聞大阪本社	1944 年
大同石仏芸術論	長広敏雄	高桐書院	1946 年
大同の石佛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	座右宝刊行会	1946 年
雲岡の石窟とその時代	水野清一	創元社	1952 年
雲岡石窟調査記　16 巻 33 冊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	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	1951 年～1956 年
アサヒ写真ブック (6) 雲岡石仏めぐり	朝日新聞社編・刊	朝日新聞社編・刊	1954 年
山西古蹟志	水野清一 日比野丈夫	中村印刷出版部	1956 年
雲岡と龍門　中国の石窟美術	長広敏雄	中央美術公論社	1964 年
世界の文化史蹟 第 7 巻 中国の石窟寺	永廣敏雄	講談社	1969 年
雲岡石窟　（中国文化史蹟）	長廣敏雄	世界文化社	1976 年
雲岡石仏譜	小池秋羊	東出版	1977 年
雲岡の石窟	小川晴暘	新潮社	1978 年
雲岡石窟の旅	NHK 取材班	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1979 年
大同雲崗の大仏蹟図録	五十嵐牧太	五十嵐牧太	1983 年
雲岡日記 大戦中の仏教石窟調査	長廣敏雄	NHK ブックス	1988 年
天人誕生圖の研究 東アジア仏教美術史論集	吉村怜	東方書店	1999 年
雲岡石窟文様論	八木　春生	法蔵館	2000 年
北魏仏教造像史の研究	石松 日奈子	ブリュッケ	2003 年
雲岡石窟　遺物編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報告	岡村秀典	朋友書店	2006 年
エジプトと日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著「雲岡石窟」へささげるオマージュ	大山みどり	アートヴィレッジ	2007 年
雲岡石窟 仏宇宙	六田知弘	富山房	2010 年
雲岡石窟の考古学：遊牧国家の巨石仏をさぐる	岡村秀典	臨川書店	2017 年